

1949 - 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

“共產黨一槍都不用開就可以使葡萄牙在澳門的主權實際上陷於癱瘓。祇要關閉關閘就可以做到這一點”¹。

澳門文化革命前的葡中關係由兩個不同的階段組成：第一階段是中國大陸圍困澳門；第二階段是葡台關係逐漸斷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明顯改善。第一個階段從1949年至1960年，是中國大陸對澳門實行長期圍困的時期。然而，國際政治局勢最終是有利於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並緩慢但決定性地推動了事實非正式政治共管的產生。第二階段從1961年至1966年，期間葡台關係逐漸斷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顯著改善。然而，不能認為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改善必定導致了澳門紅色資本家同胞與葡萄牙當地政府關係的改善。恰恰相反，澳門的葡萄牙政府與本澳的紅色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在此期間逐漸惡化了，原因是葡萄牙政府分別在1960年和1961年擬議將黃金入口和博彩兩項專營權批給香港的華人資本家競爭對手。在此期間，台灣的活動不斷受到當地葡萄牙政府的限制，另一方面，葡萄牙外交部試圖說服薩拉查同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然而這種努力因薩拉查堅定的不妥協態度而告失敗。

中國大陸圍困澳門，1949 - 1960年

共產黨在大陸奪取政權後，葡中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葡萄牙對外政策朝不承認中國大陸的方向發展，而中國則首次公開表明了它對澳門的政策。這兩種政策導致兩個國家正式宣稱對本澳的擁有權，但它們實際上均無意根本改變本澳的現狀。葡萄牙的興趣主要限於維持殖民制度，這是薩拉查獨裁統治的支柱之一，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都要堅持。與此同時，北京政權的首要考慮是利用本澳以打破

* 謹此向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館長 Isabel Fevereiro 博士及該檔案館的 Pinto Soares 博士對本人的研究工作給予的慷慨及時的支持致以誠摯的謝意。向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國立檔案館和里斯本國立圖書館期刊廳的工作人員給予的寶貴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 現職於馬尼托巴大學（加拿大）和里斯本大學社會學院

1. 東坡國立檔案館，1956年9月6日外交部秘書長 Henrique Caldeira Queiroz 大使與中國（台灣）外交部部長王華正（譯音）在里斯本秘密談話報告，AOS/CO/NE-23, Pt. 19, fls. 394-395, AN/TT, 里斯本。

針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和經濟封鎖，將澳門作為聯繫海外華僑的跳板，作為與外國接觸的中心，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

葡萄牙的意圖是維持神話般的殖民帝國，這是當時政權的思想意識使然。1952年頒佈海外組織法²，1950年年中開始實施發展計劃，1961年建立葡萄牙經濟空間³，其明顯政治意圖是將澳門和其他的殖民地納入遼闊的殖民帝國。下面我們就會看到葡萄牙政權如何推行這樣的一體化政策，儘管遭到中國的抨擊。

另一方面，共產黨中國對保持現狀懷有特殊的興趣；事實上它希望透過澳門打破西方因中國1950年介入朝鮮戰爭而施加的政治貿易封鎖，維持葡萄牙對本澳的管治，作為實現其在國外(本地區和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利益的跳板。

由於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政局，這樣我們就有必要研究一下涉及港澳的中國政局。共產黨甚至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已經制定了澳門和香港的政策，決定不入侵兩塊飛地，避免與西方發生對抗，以獲取更多更好的補償。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⁴和當時任運輸部長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蘇聯獨裁者斯大林（1928 - 1953年）的特使米高揚在河北省西柏坡舉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堅持認為共產黨將打贏這場內戰，而美國則不會介入，並且認為祇有在徹底鏟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之後，才考慮與外國列強建立對等的外交關係。對毛澤東而言，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享有的特權，為新中國減少債務，驅除所有的外國軍隊和警察，是未來共產黨政府的最優先考慮。“惟一的承諾是他決定推遲收回香港和澳門殖民地，原因是其對中國的巨大經濟價值”⁵。

作為提前行動的戰略，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奪取政權前就已經加強了對澳門的華人企業的影響，並為該飛地設立了中國的“高級專員公署和影子政府”。澳門總商會和鏡湖醫院慈善會的領導機構轉由頭號紅色愛國資本家何賢主持，而且大部分成員是共產黨的幹部或與“何賢集團”關係密切的人。這個提前行動戰略還包括設立南光貿易公司，當時共產黨的貿易部長於1949年8月28日創建了該公司，目的是對殖民地的葡萄牙政府施加影響，控制和引導飛地的經濟貿易活動⁶。在澳門設立這個中國政府分支機構的正式藉口是加強澳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貿易聯繫。

2. <發展計劃>，載於 Fernando Rosas 和 J.M. Brandão de Brito 所編著的《新國家歷史字典》，第2冊，Venda Nova: Bertrand 出版，1996.第739 - 742頁。

3. <葡萄牙經濟空間/葡萄牙單一市場>，同上，第1冊，第312 - 315頁。

4. 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主要成員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載於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1994年，第69頁。

5. “His one compromise was his decision to defer the seizure of the colonial bast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because of their economic value to China”，載於《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國北京：中央歷史文獻出版社，1991年，引自 Goncharov, Sergei N., Lewis, John W. e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美國 CA, 史丹福：史丹福大學出版，1993年，第40頁。

6. 南光四十年，1949 - 1989，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1989年，第53頁。

為使葡萄牙政府留在該飛地上，新的中國當局至少使用了四個渠道：柯麟博士，中國海關專員 Carlos Basto，以及王柱（譯音，下同，Wang Zhu）和黃玉（譯音，下同，Wonglok）將軍。譬如，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9 年 10 月在廣東“清剿”期間，中國新的軍政領導人曾向澳門的葡萄牙政府給予政治保證，謂本澳的地位不變。當時任中國軍事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共產黨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市委書記和廣州市長的葉劍英將軍，於 1949 年 10 月 27 日任命柯麟博士，“目的是接觸我們的當局，秘密處理有關澳門和廣東關係的所有事宜”⁷。中山軍分區司令王柱將軍則通過灣仔中國海關助理專員 Carlos Basto 向澳門總督柯維納轉達中國對澳門的新政策。轉達的信息非常明確：

“1. 共產黨當局尊重澳門的中立，紅軍的任何成員都不會試圖進入我們的殖民地，無論是軍裝還是攜帶武裝；2. 澳門與中國之間的水路交通可以照常進行，共產黨當局希望（海外？）‘回國的中國人’（我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裡的意思）能得到葡萄牙當局的善待，希望葡萄牙當局不要阻撓中國人高興的和平遊行；3. 葡萄牙當局可以訪問中國並受到‘歡迎’⁸。

另一方面，與澳門毗鄰的中山軍分區軍事委員會主任黃玉將軍於 1949 年 11 月 10 日向澳門的《大眾報》發表了如下聲明：

“人民解放軍不是侵略軍，因此臨埠澳門的地位將得到絕對的尊重。我們還希望澳門政府當局尊重解放軍。軍隊沒有派到澳門和中國的邊境，也沒有派到中立區。這清楚表明，解放軍極其尊重臨埠政府的運作”⁹。

甚至當兩個同情中國共產黨的葡萄牙人偷偷溜到中國時，中國新當局亦將他們通過關閘移交給葡萄牙政府¹⁰。

儘管中國共產黨並無意侵犯澳門，但葡萄牙政府還是採取了預防措施，於 1949 – 1950 年間派了約 6000 名軍人到澳門加強防務¹¹。1949 年 10 月 20 日，薩拉

7. 東坡國立檔案館，1949 年 10 月 27 日澳門總督柯維納致殖民地部長 Teófilo Duarte 第 117 號密電），AOS/CO/UL – 10A3, Pt.4, 1.º sbd. (5), fl.236, AN/TT, 里斯本。

8. 外交部，《1949 年 11 月 11 日葡萄牙駐中國(澳門)辦事處談判事務代辦 João Rodrigues Simões Affra 發來的 157 號電報》，第 3 冊，卷宗第 34, 27, 第 1 和 2 頁》，3.º P., A.10, M.45, AHDMNE, 里斯本；及東坡國立檔案館，《1949 年 11 月 11 日澳門總督柯維納致殖民地部長 Teófilo Duarte 第 131 號密電，第 1 和 2 頁》，AOS/CO/UL – 10A3, Pt.4, 1.º sbd.(5), fls.254 e 255, AN/TT, 里斯本。

9. João Guedes, 《澳門新聞界：報刊如何談論二次世界大戰》，澳門：第 1 組，第 7 期（1987 年 12 月），第 33 頁。

10.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戰後的澳門與中國》，澳門：葡萄牙東方學會，1992 年，第 64 – 65 頁。

11. Carlos Pinto Santos, 《Costa Gomes 元帥之澳門時期》，澳門：第 2 組，第 42 期（1995 年 10 月），第 9 和 10 頁；及文德泉，《澳門軍人》，第 2 版，澳門：澳門政府印刷局，1984 年，第 522 – 523 頁。

查總理表明了這樣的憂慮，他對文人省長、全國聯盟縣委員會和議員候選人發表了如下講話：

“今日亞洲的最大三件事是，印度斯坦出現了兩個大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後可能發生的變化以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成立。果阿在地理上是印度的，澳門是在中國領土內，帝汶與印尼一牆之隔。這就是我們的憂慮，還不包括原來就有的困難。我們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困難；問題在於如何避免暴力並尋找尊重法律和協調利益的途徑。……澳門並不是一個靠軍事征服或統治的例子；而是歐洲與東方最早進行接觸聯繫的典範，在歷史上得到尊重，視作不同種族相互理解和友誼的一個象徵。他們在那裡匯聚，在那裡融合，在那裡和平共處，互相尊重。無法預見新當局的行動，也無法預見他們的近期打算。我們有正當理由認為，重建被漫長戰爭和國內爭鬥拖垮的遼闊帝國時，掌握政權者必需更重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而不是其根基和可行性都有疑問的思想體系。然而，重大事件戲劇性演變方面的睦鄰關係提示我們要謹慎行事，因此防衛不斷得到加強，為瞬息而來的必要情況作好準備”¹²。（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儘管在軍事防衛上作了努力，但共產黨從 1949 年 10 月在廣東掌權起就開始製造一系列的邊境衝突，目的是試探澳門葡萄牙政府和薩拉查對飛地和中國新制度的意圖。他們所使用的藉口是葡萄牙當局庇護國民黨的船隻。1950 年 2 月 7 日，香港的共產黨報刊刊登了廣東省省長、軍事長官兼廣州市市長葉劍英的一份公告，指責葡萄牙政府於上一年的 11 月 5 日向正在逃避人民解放軍海軍追捕的一艘國民黨船隻提供幫助，因此踐踏了其自行宣稱的中立立場。為了恫嚇葡萄牙政府，葉劍英將軍稱“人民解放軍保留針對該事件採取行動的權力”¹³。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約瑟·卡爾維特·德·馬卡朗伊斯(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將公告視作“一種花招，旨在促使葡萄牙當局明確其對北京政府的立場”¹⁴。無論是里斯本的還是澳門的葡萄牙當局都沒有對公告作出回應。

薩拉查拒絕承認北京政府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掌握政權，給葡萄牙政府出了一道政治外交難題。1950 年 8 月，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約瑟·卡爾維特·德馬卡朗伊斯經葡萄牙外交部長批准離開了中國，共產黨設置了一些障礙，但不久就清除了。在 1950 年年度報告裡，外交官卡爾維特·德·馬卡朗伊斯這樣寫道：

“為清楚說明起見，我需要補充如下意思，我仍然認為葡萄牙官方代表，外交和領事使團人員，早就應該撤離中國，在承認北京

12. Oliveira Salazar, 《政治演講和筆記, 1943 – 1950》, 第 4 卷, 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出版, 1951 年, 第 446 – 448 頁。

13. 《中國紅色分子指責澳門》, 《紐約時報》(1950 年 2 月 8 日), 第 2 頁。

14.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前引作品, 第 63 頁。

政府後再返回。這些代表目前的徒勞無功和低聲下氣的狀況可加強本人的這種看法，以下可清楚地表明本人的看法：無論葡萄牙政府將來是否在外交上承認北京政府，葡萄牙駐中國的領事早應該撤離崗位，甚至在共產黨力量到達之前就應該這麼做，抑或，如果無法這麼做，那麼與外界聯繫恢復之後也應該這麼做。這個問題直接涉及本人，因此我無法在這裡進行詳細的觀察研究，然而我不能不澄清這個問題，以便我對承認北京政府的觀點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¹⁵。（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約瑟·卡爾維特·德馬卡朗伊斯的觀點與葡萄牙駐中國最後一位大使費雷拉·達·豐塞卡（J.B.Ferreira da Fonseca）的一致，與駐上海總領事阿爾曼杜·羅坡·西蒙（Armando Lopo Simões）以及駐香港總領事愛德華多·巴拉桑（Eduardo Brasão）的看法亦相同，他們均主張承認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長兼政治談判司司長安東尼奧·德·法利亞（António de Faria）以及當時任司令的柯維納均持相同的看法。儘管政府高層官員達致政治共識，但薩拉查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堅決反對承認北京政府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¹⁶。

儘管不承認也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但這並沒有阻礙葡萄牙政府在這塊土地上有尊嚴地與中國大陸打交道，而中國在本地的“代表”則試圖影響澳門的葡萄牙政府採取對中國利益有益的行動。此外，經新華社唆使，1950年3月8日在澳門創辦了共產黨周刊《新星報》，目的是對葡萄牙政府施壓，促使其行動有利中國大陸的利益，向本澳的華人居民灌輸中國的“真正社會主義”，打破國民黨對當地華人報刊的壟斷。儘管並沒有在葡萄牙政府登記註冊，但這家報紙滲入這塊飛地的方方面面¹⁷。

朝鮮戰爭有利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

中國共產黨對西方兩塊飛地的政策，深刻地受制於1950年10月25日對朝鮮戰爭的考慮不周的軍事介入。維持香港和澳門的政治現狀，成為北京政府的關鍵問題。在六個星期的時間裡，西方主要列強——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單方面對中國實施封鎖¹⁸。後來，聯合國表示支持，西方列強在高度機密的巴黎統籌委員會¹⁹內協調力量，擬定三份長長的國際清單，禁止向北京出售任何戰略物資。該

15.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前引作品, 第 97 頁。

16.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失衡的對外政策：葡萄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和領事關係的若干嘗試, 1949 – 1979》(待發表的作品)。

17. Henrique Rola da Silva, 《澳門華人報刊：歷史背景》，澳門：新聞署，1991年，第 72 頁。

18.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葡中關係中的澳門概況：太平洋戰爭末至 1995 年間編年史、文獻、附錄、書目選編》，Winnipeg, 馬尼托巴大學，1996 年(待發表的作品)，第 39 – 40 頁。

19. COMCO(巴黎統籌委員會), 英語縮寫為 COCOM, 是一個高度秘密的機構, 於 1950 年 1 月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成立的, 它負責指導監督對當時的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實施的國際封鎖。幾乎所有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都參加了該機構, 愛爾蘭和日本是在 1952 年才加入的。葡萄牙於 1951 年 4 月 30 日應英國邀請參加該機構。葡萄牙駐該委員會首任代表是著名外交官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國際封鎖有助於加強兩塊飛地對中國所具有的政治貿易重要性，加強了毛澤東於1949年2月與米高揚會談時堅持的政策。

事實上，澳門紅色愛國資本家立即對北京政府打破西方對中國封鎖的指示予以響應。他們知道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是靠走私維持財政的，而且他們在走私方面已經有很多經驗；在日本佔領中國期間以及內戰期間他們都是此類貿易活動的主要組織者²⁰。

澳門的紅色愛國資本家和澳門經濟司負責人貝特羅·約瑟·羅布(Pedro José Lobo)從事的早期走私活動之一是向北越走私軍火²¹。澳門不僅走私軍火，而且還變成中國賴之獲取西方列強禁止向中國出口的“戰略物資”的重要中心，主要有橡膠、鋼、銅、汽油以及電子和交通設備。台灣情報部門認為：

“根據此間昨天公佈的非官方報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最近指示廣東省長（葉劍英）在香港澳門購買飛機引擎、汽車、汽油、輪胎、醫療用品和通訊設備等”²²。

國民黨方面的消息來源告訴《曼谷郵報》，南光貿易公司在澳門半島北面靠近青洲的地方擁有巨大的倉庫，儲存了石油、橡膠、廢鐵、輪胎、汽車零件、化學品以及其他列入國際禁運清單的“戰略物資”。由1950年曾訪問香港、澳門、日本和朝鮮的參議員Herbert O' Connor主持的美國參議院出口政策及控制小組委員會調查員Kenneth R.Hansen確認了上述活動²³。在1989年8月為慶祝創建周年而出版的官方圖書中，南光貿易公司亦對其在打破西方封鎖中所發揮的作用沾沾自喜：

“當時公司的主要活動是為中國內地獲取急需的原材料，而同一時期的出口則劇減”²⁴。

1952年邊境衝突

這種嚴重的衝突正是中國當局針對葡萄牙政府制止“戰略物資”走私到中國的企圖採取的一系列報復性懲罰，亦是紅色愛國資本家和澳門社區顯赫頭目反對提高

20. 傅老榕，高可寧，張志剛和梁昌，均是何賢非常信任的人，他們在日本佔領中國期間深深地捲入走私活動。

21. <軍火經澳門流向胡志明>，《曼谷日報》(1950年9月23日)，第7頁，及Eduardo Brasão《Memorial de D.Quixote(堂吉珂德)》，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出版，1976年，第252-253頁。亦可參閱外交部，《1950年6月8日葡萄牙駐中國使團秘書長João Rodrigues Simões Affra第102號絕密文件摘要》，《1950年6月9日葡萄牙駐中國使團秘書長João Rodrigues Simões Affra關於向印度支那叛亂分子提供武器的第105號秘密文件》，《1950年7月5日葡萄牙駐中國使團秘書長João Rodrigues Simões Affra關於向印度支那叛亂分子走私武器的第119號秘密存檔文件》以及《1950年5月16日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Eduardo Brasão和澳門葡萄牙守軍參謀長João Silva少校秘密談話記錄》，2.º P., A.6, M.405, AHDMNE, 里斯本。

22. <來自台北的電報>，《日本時報》(1950年12月6日)，第4頁。

23. James Daniel,《Study of Red China Embargo Uncovers Dangerous Leaks: Vital War Goods – Even American – Is Getting Thru, Senate Told》，Memphis Press (17 de Setembro de 1951), pag.13.

24. 《南光四十年》，前引作品，第53頁。

黃金進口稅和設立黃金進口監察委員會的結果。面對西方列強官方態度的強硬，該制度亦得到加強，這樣香港在此類活動中的作用減弱。然而澳門對共產黨中國的重要性提高了，向中國出口各類戰略物資：從汽油到輪胎。得知澳門正在打破封鎖，西方列強對葡萄牙中央政府施加國際和雙邊壓力，要它制止走私活動。由於受到外部政治壓力——尤其是來自巴黎統籌委員會中國小組委員會²⁵和美國的壓力，澳門政府根據海外部的指示，於1952年1月23日在《政府公報》上公佈了第1207號立法性法規，據此成立了貿易協調委員會，其“職責是監察和頒發貨物進出口和轉口的許可證”²⁶，目的是減少澳門和中國之間列入巴黎統籌委員會三份國際禁運清單的“戰略物資”的貿易²⁷。

中國人迅速對這個政治挑戰作出反應。兩星期後的1952年2月5日，總督史伯泰向海外部部長薩爾門托·羅德利戈斯（Sarmiento Rodrigues）發出一封電報，告知不久前在廣州召開了一次關於澳門的會議，高層官員和政治人物參加了這次會議。澳門總商會副會長馬萬祺和代表廣東澳門的全國人大代表柯麟，代表站在北京一邊的澳門華人社區參加了會議。一些與會者主張採取對澳門敵視的態度，因為根據他們的看法，澳門政府以美國政策為指引，而馬萬祺和柯麟則認為不應敵視澳門²⁸。

甚至在海外部部長薩爾門托·羅德利戈斯訪問澳門之前，中國軍人已於五月間在關閘挑起了一系列的衝突²⁹。在海外部部長訪問這塊飛地期間，挑釁的強度和頻度都降低了，但在7月25日下午再次激化³⁰。從25日至這個月月底，澳門受到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一個莫桑比克人（Jacinto Mundaú）因此喪命，幾名葡萄牙軍官和士兵受傷。這種極其複雜困難的局勢迫使葡萄牙政府游說英美政府和巴黎統籌委員會放寬對中國大陸的國際封鎖。與此同時，澳門代表（貝特羅·約瑟·羅布、何賢、馬萬祺）與人民解放軍於8月4日開始談判。

另外，中國人開始反擊，目的是勸說西方列強放棄設立針對中國的專門小組委員會並讓日本參加的念頭。西方主要強國確實在1952年7月28日至8月2

25. COMCHI 是高度機密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屬下的一個小組委員會，職責是密切留意北京、北韓和北越政府並提出有關的封鎖政策。

26. <1952年1月23日總督史伯泰之1207號立法性法規>，《澳門政府公報》，第3期（1952年1月23日），第31-32頁。

27. 儘管針對澳門和中國的貿易建立了嚴厲的機制，但並未取得很大的成效。1952年4月，貿易協調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均被解職，“因工作不當……發現他們曾頒發幾百噸戰略物資的進口許可證，印度號、帝汶號和魯伍馬號將這些物資從北歐港口運到澳門，然後再運去中國，違反了控制”，載於外交部，《‘封鎖政策下的澳門防衛新指引’之工作情報，Mena Mendonça，1956年7月2日，第43-44頁》，2.º P., A.6, M.430, AHDMNE, 里斯本。

28. 東坡國立檔案館，《1952年2月6日海外部長辦公室致內閣主席辦公室公函》，AOS/CO/UL 10A3, Pt.32, fl.363, AN/TT, 里斯本。

29. 外交部，《1952年7月25日、26日、29日、30日澳門軍事司令部在半島北部邊境與中國共產黨分子衝突事件的秘密報告，第1-2頁》，PAA M.131, 第3冊，AHDMNE, 里斯本。

30. 同上，第3及4頁。

日召開了華盛頓會議³¹，評估日本加入巴黎統籌委員會以及設立中國小組委員會事宜³²。

事實上當局被局勢極度困擾，指示葡萄牙駐華盛頓大使 Luís Esteves Fernandes 於 1952 年 8 月 1 日游說美國政府減少西方對中國的禁運³³。1952 年 8 月 23 日，葡萄牙政府為中國人挑起的事件作了道歉，決定對所謂的中國受傷農民向中方賠償，並允許澳門繼續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封鎖。祇是在這之後衝突才告停止³⁴。

受事件困擾的葡萄牙政府不得不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呼籲彈性處理西方對中國大陸的禁運，1952 年 12 月 16 日外交部長巴烏羅·庫尼亞（Paulo Cunha）當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同事的面作了如下聲明：

“澳門被中國領土環繞，處境困難，其面臨的潛在危險由於六月發生的事件而表面化，國務委員會主席一定了解這些情況。不能將法國人在印度支那所作努力的廣泛性與葡萄牙在澳門遇到的困難相提並論。然而可以要求國務委員會把握這些困難。如果蘇聯人攫取了歐洲在亞洲的這塊有幾個世紀歷史的飛地，那麼災難將是多方面的”³⁵。

葡萄牙當局非常有意向中國大陸自由出口，1954 年 3 月 17 日至 30 日，甚至試圖為此目的直接同美國人談判“以澳門為目的地的戰略物資”的一種“例外安排”。然而，因海外部代表的反對，談判失敗了³⁶。

導致事件發生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紅色愛國資本家與澳門黃金界的頭面人物結成了聯盟。總督史伯泰於 1952 年 1 月 19 日³⁷將 1947 年 12 月 13 日³⁸訂立的黃金進口稅從 2.00 澳門元提高到 2.50 澳門元，使黃金承批商的利潤減少了 184 萬澳門元，而葡萄牙政府國庫則從中獲益³⁹。此外還設立了黃金進口監察委員會，由葡萄牙政府四名官員組成，其職能是核定進口黃金重量的準確性並“擬定有效的核定筆錄”⁴⁰。如同貿易協調委員會，該機構主要目的是削弱貝特羅·約瑟·羅布的權力。黃金進口稅率 1963 年前一直保持不變。在那一年裡，由於何鴻燊和澳門教區

31. 加拿大、美國、法國、日本和英國參加了這次會議。

32. 外交部，<text of Recommendations Agreed at the Washington Five – Power talks>，載於《1952 年 8 月 11 日葡萄牙駐倫敦大使 Rui Enes Ulrich 致外交部長 Paulo Cunha 第 765 號函件》，2.º p., A.6, M.427, AHDMNE, 里斯本。

33. 美國國務院，《美國對外關係，1952 – 1954》，第 14 冊，<中國與日本>，美國 D.C.，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務局，1985 年，第 84、85 頁。

34. 澳門當局和中國大陸當局就結束事件的換文存放在外交部，《1952 年 9 月 16 日海外部部長辦公室致外交部秘書長第 1975 號密件》，PAA M.131, 第 3 冊, AHDMNE, 里斯本。

35. 外交部，“NATO Secret C – R(52)38”，PAA M.131, 第 5 冊, AHDMNE, 里斯本。

36.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大使向作者提供的信息。參閱外交部，《1954 年 3 月 18 日關於建立澳門調停安排的葡中談判‘記錄’》，Hall Themido 著，PAA M.130.AHDMNE, 里斯本。

37. <第 1206 號立法性法規>，《澳門政府公報》，第 3 期(1952 年 1 月 19 日)，第 21 頁。

38. <第 4283 號訓令>，《澳門政府公報》，第 50 期(1947 年 12 月 13 日)，第 971 頁。

39. 參閱附錄 12。

40. <第 5201 號訓令>，《澳門政府公報》，第 29 期(1952 年 7 月 19 日)，第 520 頁。

機關報《號角報》施加的壓力，設立了三種稅率，依進口黃金資量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稅率⁴¹。

自食苦果：毛澤東主義者的自我書刊檢查

儘管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經常揭露西方帝國主義，但他們接管政權時還是顯示了很大的靈活性。毛澤東1939年12月關於西方帝國主義的文章原文因此作了重大的變動。這篇文章1952年前一直沒有改動，這一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黨校與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毛澤東文章的一些單行本。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作了重大改動。“葡萄牙是個無足輕重的國家”的說法以及所有有關澳門的敘述都從這篇新的正式文章中刪除。後來出版的這些單行本亦採用相同的出版方針，後來的《毛澤東著作選集》亦是相同的情況。這種自我書刊檢查的目的是不讓中國人民知道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以及北京政權實行的政策的巨大矛盾：如果共產黨中國是如此的強大，而葡萄牙又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那麼為什麼葡萄牙人得以賴在這個彈丸之地呢？

當地的實用主義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儘管葡萄牙政府不承認中國，但澳門的葡萄牙政府還是與中國共產黨分子保持接觸。據科斯達·戈梅斯元帥，他任守軍參謀長時曾根據總督柯維納的指示，將兩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送到廣州，以避免在澳門被國民黨特務殺害⁴²。

然而，葡萄牙在國際上遭受的外交挫折、失望和滑坡被中國利用來揭露葡萄牙。1954年7月和8月，國大黨分子在年輕的印度聯邦共和國武裝力量和情報部門的支持下入侵佔領了葡屬印度的兩塊飛地達德拉和納加爾哈維利，共產黨中國對之表示支持，認為必須將“葡萄牙帝國主義者和殖民者”逐出亞洲。然而，在澳門問題上並沒有以相同的方式行事。

1955年取銷澳門400周年的慶祝活動

當政治觸角不太敏感的宗主國政府打算在1955年10月慶祝葡萄牙在澳門存在400周年時，中國中央政府將之視作一種挑釁⁴³。面對中國的反應，葡萄牙政府不得不作出全線的讓步：取消特種郵票的發行，取消宗主國部長的來訪，為慶典活動而豎起的雕像亦被摧毀。中國當局通過外交和新聞渠道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所使用的外交渠道是香港總督和英國的外交使團，他們事實上是在北京的“葡萄牙利益代表處”。局勢的嚴重性因北京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直接介入變得具典範性。根據香港總督Alexandre Grantham，周恩來總理於10月8日向他傳遞了如下信息：

41. 〈第3769號訓令〉，《澳門政府公報》，第48期（1963年11月30日），第1373頁。

42. Carlos Pinto Santos,《Costa Gomes元帥之澳門時期》，上述作品，第13-14頁。

43. 慶典活動計劃由1955年1月3日史伯泰總督辦公室訓令公佈，《澳門政府公報》，第2期（1955年1月8日），第15-16頁。

- “a) 中國人民將之視作挑釁性的‘行動’；
- b) 中國政府在果阿爭執上沒有提出澳門問題，儘管與印度保持友好關係，然而，如果實施擬議中的慶祝活動，中國人民不會認為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
- c) 中國對此事件表示遺憾，因為中國希望與所有的鄰居和平共處，包括香港和澳門”⁴⁴。

在極度缺乏團結精神的情況，英國外交部門用了十天的時間才將周恩來的“信息”傳到內塞西達德斯宮，儘管香港總督Alexander Grantham曾建議緊急處理⁴⁵。與英國的態度迥然不同，美國國務院10月25日在華盛頓向João Rodrigues Simões Affra轉達了Alexander Grantham與周恩來的北京談話內容⁴⁶。

然而，這場危機的最重要的方面無疑是中國宣傳機構的宣傳，其目的不僅是揭穿慶祝活動，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稱澳門是中國領土。最重要的兩篇文章無疑是《人民日報》的文章和新華社電訊稿。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觀察員的評論是很重要的，因為“……報紙的主要功能是宣傳解釋中國最高領導人確定的道路上所採取的政策”⁴⁷。這位觀察員寫道：

“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澳門，也沒有忘記從葡萄牙人手中收回這塊領土的權利。……澳門尚未回歸中國的事實，並不意味着中國人民容忍澳門長期被佔領”⁴⁸。

這位觀察員還說澳門的葡萄牙政府不應該將中國的和平政策視作“軟弱的跡象”，指責慶祝活動是對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的挑釁和侮辱，並告誡說“今日中國已不是六年前的中國，更不是400年前的中國”。這篇社論的意義顯然非常重大；因為，北京廣播電台和共產黨中國駐外國使館的簡報都摘要播發刊登了這篇文章。此外，新華社編輯部於10月28日發表了“葡萄牙佔領澳門始末”，用嚴厲激烈的語言歷數了澳門被佔領的400年，以及將“殖民地”這個正式名稱改為“省”，並

44. 外交部，《1955年10月18日英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參贊向外交部長Paulo Cunha遞交的備忘錄》，2.º P., A.62, M.214, AHDMNE, 里斯本。

45.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Pag.186.

46. 外交部，《1955年10月26日葡萄牙駐華盛頓大使João Rodrigues Simões Affra第209號電報，第947號卷宗》，2.º P., A.62, M.214, AHDMNE, 里斯本。

47. A.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CO e Baltimore, MD, EUA: Westview Press 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5, pag.118.

48. “Macau is Chinese territory. The Chinese have never forgotten Macau, nor have they forgotten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emand the recovery of this territory from the hands of Portugal.[...]The fact that Macau has not yet been returned to China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can tolerate the long continu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Macau “in” Warning to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u”, (北京，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第1頁；新華社英文電訊稿，1955年10月26日)，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重印，n.º 1158, 1955年10月27日，pag.36.

重申了“澳門是中國領土的政策”⁴⁹。廣東省政協副主任林黎明（譯音，Lin Liming）在10月27日的講話裡亦重申了《人民日報》的觀點，指責澳門葡萄牙政府庇護國民黨特務，揭露台灣外交部在澳門設有代表處，並列舉了澳門葡萄牙政府對國民黨和美國的破壞活動給予的“保護、合謀和支持”⁵⁰。

隨着美國公開支持葡萄牙的海外政策，對葡萄牙的攻擊再次激化。葡萄牙外交部長巴烏羅·庫尼亞1955年訪問華盛頓時，其美國同行保守派頭領杜勒斯在聯合公報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明支持遠東的“葡萄牙省份”。宣傳機器隨即再次開動揭露葡萄牙⁵¹。影響很大的澳門總商會會長紅色愛國資本家何賢1955年8月25日被任命為當時的澳門諮詢會成員⁵²，代表中國社群，並一直擔任該職務直到1974年，然而，除此之外，澳門的地位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儘管葡方在澳門作了讓步，但中國共產黨旨在影響葡萄牙政府和華人社群的攻擊和努力仍然沒有停止。廣東政府於1956年2、3月派了一個中國民間藝術團來澳，葡萄牙政府接納了，但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拒絕了。共產黨在澳門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美國政府於1956年1月6日發佈了一道國家安全令，禁止美國軍人到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和“敏感的地區”旅行，其中就包括澳門。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成為美國各情報機關1957年3月19日的“國家情報評估”對象，該文件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正致力於將香港和澳門統一到中國。然而，他們認為共產黨中國不會使用武力奪取西方的這兩個殖民地。文件預測北京會採取不同的手段和策略加強在這兩塊飛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目的是減少其作為西方針對中國的監聽站作用，削弱英國和葡萄牙繼續管治兩塊飛地的政治意願⁵³。

中國大陸和台灣1956年8月23日至10月5日在台灣海峽發生的軍事衝突，亦在澳門產生了反響。由於中國大陸施加壓力，外交部秘書長恩里克·卡爾德拉·克洛斯告知在里斯本的中國（台灣）外交部長王華正（譯音，Wang Huazheng）必需撤出台灣駐澳門特別代表並不再派代表駐澳門。此外，還告知如下：

“共產黨一槍都不用開就可以使葡萄牙在澳門的主權實際上陷於癱瘓。祇要關閉關閘就可以做到這一點”⁵⁴。

共產黨周刊《新星報》停刊，中國大陸非正式機關報暨澳門親北京華人社區派別控制的報紙《澳門日報》於1958年8月15日創刊，共產黨中國對本澳的影響隨

49.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Occupation of Macau”, (北京，新華社英文電訊稿，1955年10月28日)，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重印，n.º 1160，（1955年10月29至31日），第47 - 48頁。

50. 《China and Portugal: Portuguese Provocations Denounced in Guangzhou》(廣州，新華社英文電訊稿，1955年10月27日)，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重印，n.º 1159，（1955年10月28日），第33 - 34頁。

51.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葡中關係中的澳門概況》，前引作品，第68 - 69頁。

52. 《澳門政府公報》，第35期，（1955年8月27日），第547頁。

53.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葡中關係中的澳門概況》，前引作品，第73頁。

54. 東坡國立檔案館，《1956年9月6日外交部秘書長 Henrique Caldeira Queiroz大使與中國（台灣）外交部部長王華正（譯音）里斯本秘密談話報告》，AOS/CO/NE-23, Pt.19, fls. 394-395, AN/TT, 里斯本。

之得到加強⁵⁵。這份日報成為向澳門政府施加壓力的力量，爭奪國民黨在本澳中文報刊的霸主地位。其與共產黨的政治接觸以及其本地代表均是如此之好，以至於這份報紙沒有遭到葡萄牙的新聞檢查⁵⁶。

中國不僅通過這份報紙強烈地表明其在澳門的存在，而且還通過向這塊飛地供水令人感到它的權力。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本澳嚴重乾旱，因此從中國大陸輸入食用水並實施配給供水。經總督白覺理以及澳門自來水公司總裁暨市政廳行政委員會主席 Pedro Hyndman Lobo 的同意，澳門總商會會長何賢作為中介人參與了與中國大陸當局的談判⁵⁷。然而，“灣仔次級提水站……僅運作了三個月，較預期的為短，是中國當局造成的，儘管從中國輸入的水是由澳門自來水公司付款的”⁵⁸。

葡萄牙旨在為澳門修建一個機場的政治努力，實際上亦是被中國當局扼殺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期間，總督史伯泰、白覺理、羅必信都曾打算在澳門修建一個機場，然而中國當局堅決反對修建。曾於1962至1966年間任澳門總督的羅必信將軍1991年說，他曾於1962年建議宗主國的民航總局研究在氹仔島東的雞頸修建機場的技術可行性：

“在澳門修建一個機場的想法，目前（1991年）正在施工，這不是新聞。祇不過當時必須適應當時的航空和機場手段方面的特點，適應本澳的施工技術手段和公共財政方面的實際可能性，而且，更主要的是，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這是計劃最終擱淺的決定因素”⁵⁹。（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最後是葡萄牙政府的後退、讓步和息事寧人的政策——儘管遭到抗議——使殖民地的存在超過預期的時間。中國內戰期間，葡萄牙徹底放棄了“玫瑰色地圖”，根據該地圖原先計劃控制灣仔島、Bugios 島、小橫琴島、大橫琴島、中山島。內戰期間警察崗亭逐漸撤離。由中國人挑起的邊境衝突結束後亦發生相同的情況，目的是迫使葡萄牙政府放鬆對以共產黨中國和北越為對象的走私活動的控制。除了要對挑起衝突而表示道歉外，還必須向中國人賠償，對本澳的走私活動“閉上眼睛”

葡萄牙在澳門遇到的巨大困難再次得到總理薩拉查的非常現實的認同，他在1961年6月30日的講話中談及議會的海外政策：

55. Henrique Rola da Silva, 前引作品, 第72頁。

56. João Guedes, <澳門新聞界：5月28日及本地報紙>, 《澳門》, 第1組, 第6期（1987年11月）, 第47頁。

57. 係澳門市政廳市政化驗所處長 Maria Luísa Portugal Basílio 工程師慷慨提供的資料。詳細情況可參閱 Maria Luísa Portugal Basílio 的題為“人口發展與澳門供水”的論文, 澳門暨珠江三角洲人口國際研討會, 第2冊, 澳門, 統計暨普查司, 1993, 第369–387頁。

58. Maria Luísa Portugal Basílio 工程師的公文, 1995年6月3日。

59. 羅必信 (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 <聖桑切陽台：前總督羅必信回憶錄>, 《文化雜誌》, 第16期（1991年10月/12月）, 第185頁。

“我們稱之為澳門省的地方，幾乎祇包括以上帝名字命名的城市，是遠東一個休憩場所，位於中國大陸內。該省份曾經歷繁榮和衰退，目前的衰退歸因於美國對中國的封鎖，使澳門喪失了大部分的貿易。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它正在忍受自然限制。作為葡萄牙主權轄下領土的澳門是根據葡萄牙國王和中國皇帝簽訂的古老條約而建立的，因此，如果這些法律文件在政權更迭後像所期望的那樣具有效力，那麼該地區的個性和其納入葡萄牙的狀況就得到保障。然而，如果我們脫離合法領域而訴諸其他要素，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我們的抵抗價值有多大，日常活動完全依賴中國的澳門終將被中國吞併。西方世界在文化上將變得更為貧乏”⁶⁰。（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聖若昂巴蒂斯塔德阿祖達堡的陷落以及四個星期後的12月“葡屬印度”的垮台，是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一個不祥之兆。1961年8月1日，慶祝擺脫法國獨立一周年時，西非的小小法語國家貝寧共和國（當時稱達荷美），入侵並單方面吞併了聖若昂巴蒂斯塔德阿祖達堡，這是個面積祇有約一平方公里的細小葡屬飛地，祇有兩個葡萄牙居民：上尉 Saraiva Borges 和秘書 Augusto Meneses Alves。

然而，六十年代初葡萄牙海外政策這場重大失敗無疑意味着葡屬印度的崩潰。印度對葡萄牙取得的這場反響巨大的勝利，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廣泛支持，中國於1961年12月19日發表了一篇非正式照會，對印度聯邦政府奪取果阿、第烏和達曼表示高興和支持⁶¹。

在葡萄牙遭受重大政治挫折的同時，中國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與葡萄牙在非洲的海外政策對立；由此中國開始對非洲葡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給予政治、軍事和外交支持。為了在新獨立的非洲國家中營造“革命國家”的形象，中國當局於六十年代初強化了其對葡屬非洲解放運動的支持。

然而，這種變化的後果卻是葡萄牙在澳門存在的戰略價值得到提升，升至中國政策矛盾的頂峰。中國支持葡屬非洲解放運動的作法不久就顯示出矛盾，而當時蘇聯的宣傳機器則向全世界揭穿傳播這樣的矛盾。蘇聯人提出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中國不把葡萄牙人逐出中國的領土怎麼能夠支持非洲的解放運動呢？

這樣的指控隨着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分歧升級有加劇的傾向，然而澳門卻從中獲益，其部分原因與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有關。中國大陸的一些特務被派到澳門以便熟悉葡萄牙人的語言、文化和思維方式，目的是向葡屬非洲解放運動提供支持，這種情況確實有利於保持這塊飛地的地位。

葡台關係逐漸斷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明顯改善，1961 – 1966

在外交上接近中國的想法在1961年和1964年曾經有過兩次嘗試。1961年印度入侵果阿前，當時的海外部部長Adriano Moreira 試圖與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

60. 〈總理薩拉查1961年6月30日在第八屆議會第217次（特別）會議上的講話〉，載於第217號《會議錄》，1961年7月1日，第925頁。

61.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葡中關係中的澳門狀況》，前引作品，第90頁。

向北京政權在果阿問題上放棄一些軍事便利。然而，由於印度入侵果阿，計劃流產了⁶²。

此外，北京政權在對葡關係上歷來都顯示某種開放態度。1960年1月，澳門的五位知名葡萄牙人以私人的名義啟程赴中國。然而，倫敦的每日電訊於1960年2月10日將是次訪問解釋為里斯本和北京進行談判的一種嘗試，目的是葡萄牙政府將澳門歸還中國。這則消息發表三天後，總督馬濟時以及訪問過中國的葡萄牙代表團成員在《澳門新聞報》⁶³上發表公告，對每日電訊的消息內容作了闢謠。

這次訪問後的一年半又有一次訪問，但這次是葡萄牙新聞界的一位人物。里斯本《人民日報》編輯部副主任記者 Mário Rosa 應北京《光明日報》的邀請對中國進行了為期19天的訪問，訪問從1962年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持續到8月第三個星期⁶⁴。葡萄牙一家報紙第一次發表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樂觀看法的系列文章。在香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Mário Rosa 聲稱沒有在中國看到饑饉的跡象，還說他的旅行目的是發展里斯本和北京之間的文化、教育和友好關係。

北京和里斯本之間的這種接近遭到1953年至1964年間任蘇聯領導人的赫魯曉夫的猛烈抨擊，他在最高蘇維埃（裝璜門面的議會）會議上揭露北京懦弱，允許西方兩塊殖民地繼續在中國領土存在：澳門和香港。與此同時，他對印度當局結束葡萄牙在印度斯坦的存在所採取的行動表示讚揚和祝賀，並指出中國領導人在澳門和香港問題上應該採與此相同的政策。蘇聯政權的非正式喉舌《真理報》和塔斯社對這次講話作了報道⁶⁵。可能受蘇聯共產黨的壓力，親蘇的美國共產黨發表了一篇內容與赫魯曉夫講話一樣的公告⁶⁶。面對這種挑釁，中國人的反應是於1963年5月8日在中國共產黨非正式機關報《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為香港、澳門和台灣政治地位的維持以及“條件成熟時通過和平談判”⁶⁷解決這些領土問題的政治決定作了辯護。

北京政權就這樣清楚地確認了對這三塊領土的政策，幾個星期後邀請澳門的一個代表團參加廣州春季交易會。應何賢的邀請，澳門經濟暨統計司省辦公室主任 Horácio Teixeira Duarte 在澳門廠商會主席彭彼得的陪同下前往廣州，1963年的4月1日至28日期間參加了廣交會。在廣州期間與廣交會主任兼廣東政府外貿辦公室主任共進午餐，“他對澳門、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問題以及中國產品的未來市場懷有強烈的‘興趣’。向他介紹了澳門向上述幾個海外省出口的主要產品，包括中國傳統

62.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失衡的對外政策：葡萄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和領事關係的若干嘗試, 1949-1979》(是一篇待發表的作品)。

63. <新聞發佈>及<聲明>, 載《澳門新聞報》, 1969年2月13日, 第1頁。

64. 據葡萄牙秘密警察, 訪問始於1962年7月24日。Mário Rosa 由澳門親共產黨的《大眾報》社長中國“記者”蔡凌霜陪同, 這家報紙是何賢的產業, 蔡凌霜在 Mário Rosa 澳門逗留直至赴廣州期間是何賢的翻譯, 外交部, 《1962年9月12日保安部中央科第51-SC/CI(2)號》, 第1頁, PAA M.795, AHDMNE, 里斯本。

65.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葡中關係中的澳門狀況》, 第96頁。

66. 同上, 第97頁。

67. 同上, 第99頁。

產品……這位人士懷着明顯的興趣傾聽所有的解釋，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地區表示欽佩，因為他覺得它們是更小的地區”⁶⁸。

第二次與中國在外交上接近的想法源於1963年9月1日，當時影響力很大的葡萄牙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格拉（Franco Nogueira）收到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代表、聯大前主席Zafrulla Khan的一個信息，稱：“傳說巴基斯坦和‘共產黨’中國希望接近葡萄牙”⁶⁹。這個機會馬上被弗朗哥·諾格拉加以利用，這位擔任最高外交職務的職業外交官在遠東具有豐富的經驗，他於太平洋戰爭後在那裡擔任了多種外交職務。弗朗哥·諾格拉當時對“美國和國民黨在澳門的間諜活動使澳門的安全處於危險之中”⁷⁰表示憂慮。

從那時起，薩拉查的繼承人認為在政治上是時候與北京接近了。兩天後，即9月18日，由於受到廣州共產黨當局的強大壓力，海外省指示澳門葡萄牙政府發出一份半官方照會，聲明本澳政府不會容忍在澳門進行的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行動，無論是多麼的難以相信，捲入此類活動的人將被逮捕並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⁷¹。然而，對共產黨中國的這種讓步並沒能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滿意，原因是葡萄牙當局拒絕移交於1963年6月被捕的七名台灣特務，當時這些特務在靠近澳門領海處受到人民解放軍巡邏艇的追擊。然而，1963年9月23日，中國（台灣）駐里斯本使團就澳門禁止反對共產黨的活動向葡萄牙政府遞交了一份措辭強硬的抗議照會⁷²。台灣外交部發言人Patrick Sun表示葡萄牙的態度“不符合中葡傳統友誼，有悖國際慣例和人道主義原則”⁷³。內塞西達德斯宮無法對其立場加以辯解，就採取了保持沉默的作法。

兩年後，在葡萄牙中央政府的壓力下，澳門政府在一次向中國大陸的表面讓步中關閉了台灣外交部代表處和台灣在本澳的領事館，並打算承認共產黨中國，與之建立外交關係。這種作法具三重目的：將澳門置於葡萄牙管治下，從地區角度孤立印度，試圖阻止中國支持葡屬非洲的解放運動和葡萄牙的地下革命左派。葡萄牙對外政策的這種現實的靠攏作法具有堅實的基礎，是國際政壇一種非常現實的分析的組成部分。1955年喪失達德拉－納加爾哈維，1961年8月丟失聖若昂巴蒂斯塔德阿祖達堡，1961年12月，果阿、第烏、達曼相繼失守，儘管丟失的地區都是戰略上不十分重要的，但它們是葡萄牙殖民帝國逐漸崩潰的徵兆，因此葡萄牙政府希望避免澳門這個同樣不太重要的領地遭受相同的厄運。另一方面，與中國大陸結盟對葡萄牙當局來說是懲罰印度政府的一種方式，可在中印邊境製造緊張，同時導致亞洲集團的分裂，進而導致第三世界的分裂。在是次舉動中非常

68. 外交部，《1963年5月31日Horácio Teixeira Duarte向澳門總督遞交的有關訪問廣交會的報告，第6頁》，PAA M. 1166, AHDMNE, 里斯本。

69. Franco Nogueira,《一名政治家的自白：日記，1960-1968》，第3版，波爾圖：文化書局出版，1987年。第77頁。

70. 同上。

71. Mbi s é sSil vaFernandes,《葡中關係中的澳門狀況》，前引作品，第102和412頁。亦參閱第61號文件最後一段。

72. 外交部，《中國（台灣）使團抗議照會，1963年9月23日》，PAA M. 802, AHDMNE, 里斯本。

73. “Taiwan Protests Over MacauB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3年9月28日，第1頁。

明確的第三個目標，是勸說共產黨政府不要支持非洲的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從六十年代初開始打遊擊戰。葡萄牙宗主國領導人相信，中國人已經在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開始支持非洲解放運動。如三個幾內亞比紹人和三個安哥拉人——如 PAI 領導人 Amílcar Cabral 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領導人 Viriato da Cruz 和 Lúcio Lara 於 1960 年 8 月前往中國，正式參加聲援仍處於殖民主義枷鎖下的非洲人民的活動⁷⁴。在他們逗留期間，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代表團簽署了政治軍事合作協議並同時收到開展解放鬥爭的第一筆款項⁷⁵。PAI 代表團不僅獲得中國的多種支持，而且他們的一些軍事幹部還進入南京高等政治軍事學院受訓⁷⁶，1964 年還說服中國人向他們提供重型武器⁷⁷。第二年，安哥拉民族主義者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目的是爭取中國援助。六十年代經常訪問北京的葡屬非洲其他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亦獲得了類似的援助。在給予援助的同時，北京電台葡萄牙語節目於 1960 年 9 月開播，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國際宣傳機構，目的是充當心理戰的工具，以葡萄牙和葡屬非洲為對象。

葡萄牙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大好時機出現在 1964 年，在這一年裡法國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是第二個西方強國這麼做，與美國的不承認北京政府的理論決裂。這些因素的聚合促使採取是次行動的弗朗哥·諾格拉於 1964 年將 Jorge Jardim 召回里斯本，目的是說服薩拉查，讓他相信有必要與中國建立關係。Jorge Jardim 這樣寫道：

“**弗朗哥·諾格拉第二天就接見我，告訴我要與人民中國建立關係。他們是出於這次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使命的敏感性而選中了我。國務主席（薩拉查）原先猶豫，但還是同意了，就如同批准我的名字那樣。……**弗朗哥·諾格拉對我解釋說，這次外交應該是名副其實的，而且從一開始就要達致最終的結果，換言之，建立可在短期內升格為外交關係的非正式關係。人民中國對此會有政治興趣，因為它意味着一個像葡萄牙這樣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而且傳統上是反對共產黨的國家擺脫美國的專橫控制。法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遭到攻擊，祇有德國和葡萄牙持認可的立場）承認中國，是中國的巨大勝利，而我們則可以從中獲益。然而我們必須迅速行動，不要落在其他西方國家後頭，它們一定也會走相同的道路。結論是：行動一旦開始就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必須用信心和真誠去完成它”⁷⁸。

74. 東坡國立檔案館，《1960 年 11 月 11 日保安部 PIDE 中央科第 635/60 – GU 號報告》，AOS/CO/UL – 32C, Pt.3, fl.40, AN/TT, 里斯本。

75. Carlos Pacheco,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有爭議的誕生：歷史的虛構》，里斯本，Vega, 1997 年，第 99 頁。

76. Ronald H.Chilcote, Amílcar Cabral'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itical Guide, Boulder, CO, EU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ag.16.

77. Mustafah Dhada, <Guinea – Bissau's Diplomacy and Liberation Struggle>, 《Portuguese Studies Review》, 第 4 卷·第 1 期(1995 年春/夏), 第 31 頁。

78. Jorge Jardim, 《莫桑比克：燃燒的土地》，里斯本：Intervenção 出版, 1976 年，第 63 及 64 頁。

周恩來總理表示有意與葡萄牙建立關係。1964年2月7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採訪報道，中國政府首腦說中國已經準備與一些西方強國建立關係，其中包括葡萄牙⁷⁹。

然而，弗朗哥·諾格拉的計劃並沒有實現。由於政府內極右派別以及美國的強烈反對，抑或，由於眾多內部和外部因素的使然，葡萄牙政府不得不放棄與共產黨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計劃。政權中的極右派別竭力反對弗朗哥·諾格拉和內塞西達德斯宮的計劃，甚至針對外交部長的論據對之進行攻擊。而在美國，約翰遜總統對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法國公開安撫，但這預示着美國對葡萄牙計劃會有負面反應，後來發生的情況證實了這一點。美國駐里斯本大使 George W. Anderson 上將與弗朗哥·諾格拉及薩拉查進行了談話，目的是勸說他們放棄計劃。薩拉查面對這些政治壓力，終於在1964年2月13日取消了他給他的繼承人開放的綠燈。弗朗哥·諾格拉後來對此作了描述：

“……承認中國的問題在葡萄牙的一些報刊上討論過。像《商業報》這樣的報刊因經濟方面的原因主張建立關係；但明顯受極右政治勢力影響的 Dutra Faria 的文章表示懷疑；全國聯盟的一些派別以及國務主席身邊的一些人明確表示反對，其出發點是思想意識方面的。就這樣，當 Jardim 就要啟程時，薩拉查突然改變了態度，取消了使命。他對最親近的助手說明的原因是謹慎行事方面的考慮：盟國對我們與中國的理解是害怕還是向前看，可以使我們變得比現在更不討人喜歡。然而，實現這個潛在的承認將導致盟國進一步明確它們的不滿”⁸⁰。（斜體為原文已有）

儘管葡萄牙對外政策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失去了必要的調整機會，但中國的對外政策開始對西方產生小小的鬆動，與蘇聯及蘇聯集團的分歧和爭吵日益加劇，對第三世界的援助不斷增加。法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成為第二個這麼做的歐洲強國，英國是在1950年這麼作的第一個西方強國。此外，一些中等西方強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亦與共產黨中國簽訂了出售小麥和大麥的協議，從而逐漸“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封鎖。

北京顯然沒有對薩拉查的猶豫給予很好的反應。這種情況是在一名葡萄牙記者訪問中國期間首次發生的。里斯本的《人民日報》記者 José de Freitas 於1964年3-4月間對中國進行了一次訪問，但未能會見高層中國領導人⁸¹。對此羅必信這樣寫道：

“……本人今天會見了訪問了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記者 José de Freitas。他說他受到完美的禮遇。強調沒能像原先期

79.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前引作品, 第109頁。

80. Franco Nogueira, 《薩拉查：抵抗, 1958-1964》, 第5卷, 波爾圖: Livraria Civilização 出版, 1984年, 第553頁。

81. José de Freitas 就其對中國的訪問寫了一本書, 該書大部分是讚揚北京政府的。參閱 José de Freitas, 《中國戰勝過去》, 里斯本: Cosmos 出版, 1964年。

望的那樣會晤周恩來和毛澤東，也沒能向北京電台發出信息……他說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國期待葡萄牙方面採取任何姿態”⁸²。

1964年5月中旬之前中國人一直等待葡萄牙政府推動承認和關係的建立。以參加廣交會為藉口，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 Eduardo Condé到了廣州，但實際上是會晤葡萄牙駐中國南方最大城市的總領事，他應邀會見當地中國官員並前往北京。但 Eduardo Condé 的訪問僅局限於廣交會，因為北京在葡萄牙外交官訪問問題上改變了主意。表面上，這件事可能是何賢和澳門的其他紅色愛國資本家從中作梗，他們確實希望建立外交關係，但這樣的訪問會削弱他們在澳門、廣州和北京的影響力。Eduardo Condé 就其與何賢、崔樂其、蔡凌霜和 David Barrote 共進午餐的情況作了如下描述：

“我聽得多，講得少，我相信有何賢這樣處理我希望會見總領事 (Eugénio Miguel) 要求的方式，不會產生任何進展”⁸³。

這次訪問肯定沒有實現 Eduardo Condé 目的，原因是何賢從中作梗。

然而，共產黨中國領導人與前蘇聯領導人之間深刻的政治思想分歧卻提供了新的機會，澳門和香港得以走上了國際舞台。蘇聯共產黨宣傳報紙《真理報》響應赫魯曉夫的指責，於1963年7月8日就中國允許葡萄牙繼續待在澳門抨擊中國共產黨的講話和官方聲明與實際作法和政治行動自相矛盾。《真理報》認為，這樣的矛盾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亞非人民反對西方列強的解放鬥爭事業的誠意產生疑問。一些分析家認為，這種指責旨在破壞葡萄牙和共產黨中國之間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打算。

為了給中國共產黨造成政治問題，蘇聯人唆使一些解放運動在世界青年論壇上揭露中國，這是蘇聯支持的統一陣線組織。1964年9月23日，莫斯科及其盟友指責中國代表團分裂，通過了一項決議，將澳門和香港與東帝汶、巴布亞、阿曼、亞丁（南也門）的情況等同起來，並呼籲根據聯合國關於讓被殖民統治的國家和人民獨立的聲明宣佈這些地區獨立。如同所預見的那樣，中國共產黨政府強烈譴責該決議的通過，指責蘇聯再次搞小動作，並拒絕在大會最後公告上簽字。

儘管對葡萄牙的接近有鬆動，但中國仍然支持葡屬非洲的解放運動。為了增加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信用，中國共產黨繼續向非洲解放運動提供支持。如果說葡萄牙的主動行動旨在改變這種情況的話，那麼可以說並沒有產生效果。1964年8月5日，在中國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加納總統 Kwame Nkrumah 接受了周恩來派中國軍事教官到 Half Assini 訓練營地訓練葡屬殖民地和來自喀麥隆、剛果（金）、象牙海岸、尼日爾的非洲戰士的建議。加納的讓步使首批中國軍事教官開始於1963年10月抵達加納，並在那裡一直逗留至1966年2月 Nkrumah 被 Joseph Ankrah 將軍領導的政變推翻。

82. 東坡國立檔案館，《1964年4月23日澳門總督羅必信來電，致海外部部長 Silva Cunha》，AOS/CO/UL-81, Pt. 8, 1.º Sbd., fl. 1310, AN/TT, 里斯本。

83. 外交部，《1964年5月15至19日訪問廣州春季交易會秘密報告，第4頁》，PAA M.801, AHDMNE, 里斯本。

然而，這並不是中國得以顯示其存在而形成的惟一一個統一陣線。剛果（布）總統Alphonse Massamba-Débat於1964年10月批准自黑角向安哥拉各解放運動提供中國武器，以換取中國提供貸款建造一座日用品工廠。中國的這種活動在莫桑比克於1964年9月25日開展武裝鬥爭時達到高潮。對北京而言，從新生國家領導人那裡獲得的政治宣傳價值和支持對加入聯合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溫和派並不準備為外交關係的建立作太多的犧牲。中國在國際上繼續受孤立，從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得到的政治宣傳好處對中國共產黨是極其重要的，尤其是政治宣傳方面，遠較以不支持非洲人解放運動為代價推動葡萄牙承認中國更為重要。

隨着中蘇決裂，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亦波及葡萄牙。1964年4月在葡萄牙成立了葡萄牙馬克思列寧主義委員會，該地下組織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站在一起。該組織逐漸成為散發中國政治宣傳材料的工具，尤其是《北京周報》，而北京電台和地拉那電台則播發公告以及葡萄牙毛澤東主義分子的其他宣傳材料。

國際政壇的演變不利於葡萄牙，也不利於中國。葡萄牙和共產黨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國際政治孤立繼續惡化。葡萄牙不斷遭到美國的指責。從肯尼迪政府開始的美國歷屆政府都這麼做，肯尼迪政府的作法不同於前屆政府，對葡萄牙海外政策提出質疑，試圖勸說薩拉查放棄海外領地，這對當時的葡萄牙政府來說不啻是政治謬論。

而中國則陷入與前蘇聯的爭吵，與此同時美國人繼續對中國持強硬態度。眾所周知，中國於六十年代廢除了與蘇聯簽訂的中蘇互助防衛條約，蘇聯從而突然中止了為中國發展提供公開援助的計劃，幾個月後兩國陷入一場嚴重的邊境衝突，雙方軍隊都介入了這場衝突。

中蘇關係惡化的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日益強硬，儘管在朝鮮戰爭結束後曾有所緩和。由於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政治軍事捲入日益增強，而中國則試圖在該地區建立“影響圈”，北京對當地共產黨提供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支持是非常明確的，這種情況促使美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並使中國的日常生活產生困難。其部分原因是地區冷戰“防疫線”政策造成的，其結果是該地區發生了一系列得到美國廣泛支持的反共產黨起義，中國的國際和地區孤立狀況加劇了。

葡萄牙與中國建立關係的政治計劃流產了，然而在澳門的非官方關係仍然有實質性的改善，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與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以及兩國政府官方意識形態形成了矛盾。由於遭受嚴重乾旱，本澳當局不得不宣佈本澳發生霍亂瘟疫，時間是1961年10月4日至12日，水“供應不足是原因之一”⁸⁴。危機是如此嚴重，以至於澳門政府被迫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實行配給供水，而何賢則再次成為中介人，經總督羅必信和澳門市政廳主席兼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總裁Pedro Hyndman Lobo的批准參加了與“中國大陸當局”的談判，目的是向澳門供應未加工處理的水。通過這個達致口頭協議的談判，何賢得以說服中國大陸安裝兩個抽水站向澳門供水，一個於1962年建在灣仔島，另一個於1963年建在濱海湖島(Albufeira)，通過兩條直徑一米的輸水管道向澳門正常供水。中國向澳門供水，增加了這塊飛地對大陸的依賴。北京政府因而手握一把奪命劍，對葡萄牙政府和飛地的居民虎視眈眈：水的供應。

84. Maria Luísa Portugal, 前引作品, 第376頁。

當局同意了將水輸入澳門，但為本澳建機場的事卻沒有得到批准。如同其兩位前任一樣，總督羅必信亦打算修建一個機場以保障本澳的更大自給，無論是對香港還是對中國大陸而言都是這樣。1962年9月25日，總督羅必信公佈了1962年至1965年的澳門發展階段計劃：大規模填海造地；在填海區建新住宅區，鄰近城市低地，可容納約二萬人；外港城建，約三萬人受益，包括一些中國大陸來的移民；在氹仔東面的雞頸修建一個機場，建三個現代化的酒店、一個娛樂場以及商業、旅遊、衛生和康樂休閒中心；建立輕工業。計劃費用為一億零九百萬元澳門幣⁸⁵。如同其前任一樣，總督羅必信亦請宗主國的民航總局研究在氹仔東面的雞頸修建機場的技術可行性。幾十年後，羅必信就此寫了如下一段話：

“在澳門修建一個機場的想法，目前（1991年）正在施工，遠不是新聞。祇不過當時必須適應當時的航空和機場手段方面的特點，適應本澳的施工技術手段和公共財政方面的實際可能性，而且，更主要的是，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這是計劃最終擱淺的決定因素”⁸⁶。（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重要事件是葡萄牙旨在與共產黨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果敢政治主動性，如果得以實現的話，一定會給葡萄牙政府帶來巨大的政治分歧，將削弱政權以及葡萄牙政府對紅色愛國資本家的影響力。然而，由於政府內極右派別和美國的反對，上述政治主動行動沒能走得很遠。當政府屈服於內外壓力時，在對外政策方面仍然正式執行基督教式的僵硬的反共產主義政策；而在澳門的政策則迥然不同。實際上，政策的特點是與中國當局在各個方面進行日益加強的合作。1963年9月18日，禁止了在澳門的反共產黨活動，並在1965年3月29日關閉了台灣外交部的領事代表機構，以滿足中國當局的願望。

台灣在澳門的政治工作條件變得極其困難，1965年領事機構被關閉後尤為如此，因此中國難民拯救協會成為台灣在這塊飛地的一個重要活動中心。這個由朱鎮求（譯音，Zhu Zhenqiu）領導的慈善機構具有兩個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台灣政府可以非常容易地獲取中國難民中幾百名軍人的各種情報，他們來自中國廣東省，尋求在澳門得到臨時庇護，作為跳板再轉移到其他地方。其次，台灣政府可以掩蓋它對台灣顛覆小組的支持，這些顛覆小組將澳門作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圓形旋轉台，台灣外交部在澳門的代表機構被關閉之後尤為如此。

然而，在加強改善葡中關係的同時，澳門葡萄牙政府亦試圖逐漸減少何賢集團和澳門紅色愛國資本家的權力。其作法是不把大專營合約和工程批給當地的北京代表，而是批給與北京聯繫較少或出於商業原因想從何賢手中搶走大生意的中國個人或企業，當時的情況是葡萄牙企業或經濟集團都沒有能力參與專營合約批出競爭。1961年，自1934年起連續多次批予泰興娛樂總公司的博彩專營合約，經激烈競爭後，最後批給了何鴻燊，賽狗專營合約於1962年4月28日批給了香港的澳門賽狗有限公司（Macau Greyhound Company Limited），而連島公路的建設工程則批給了

85. 外交部，《第71-SC/CI(2)號報告，PIDE，1962年9月26日，第1頁》，PAAM.802，Pt.3，AHDMNE，里斯本。

86. 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羅必信），前引作品，第185頁。

Chee Lee 投資有限公司。對何賢傳統權力的挑戰使何賢不得不於1963年2月21日從澳門賽狗有限公司手中買下賽狗專營合約⁸⁷。將連島公路工程批給Chee Lee投資有限公司亦是何賢的一次重大挫折。何賢的工程方案被拒絕了。這項連接路環和氹仔的公路工程是1945年以來最大的工程，工程預算達四百萬澳門幣⁸⁸。另外，傳說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打算以龐大金額的標書參加黃金入口專營合約的公開競投，毫無疑問，這使紅色愛國資本家——尤其是何賢和梁昌——非常不安，他們清楚地知道1961年他們是如何輸掉博彩專營權的。

出現危機

事先認為當時就要爆發危機，確實是件困難的事情。然而，事實上，中國文化革命當時已經在澳門蠢蠢欲動，此前，就有跡象顯示面對中國當局的本澳地位的不確定性，而這種情況自1949年以來就一直存在。1965年初起這種情況變得明顯，當時中國共產黨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隨着北京市長彭真和第一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全體成員的解職而加劇。1966年8月，這種情況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一千一百多萬造反的紅衛兵到北京大串聯，幾十萬紅衛兵開赴廣東，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中國政壇第四號人物華南大頭目陶鑄以及中國共產黨溫和派的其他領導人均遭受政治不幸。

87. 〈向澳門逸園賽狗有限公司轉讓澳門賽狗專營權之合同〉，《澳門政府公報》，第9期（1963年3月2日），第247 - 249頁。

88. 文德泉，《氹仔與路環》，澳門：教育暨文化司，1981年，第58頁。

